

意大利

李凯旋

2017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界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和葛兰西逝世80周年而展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意大利涌现出了不少反思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反思左翼理论现状的作品。本年度报告将对其中颇具深度和分量的成果，进行充分展现。

一、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大众化的历史与现实

米兰理工大学伽罗法罗 (Francesco Garofaro) 为“21世纪马克思”网站撰文，以《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内容演变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大众化的历史与现实，及其所体现出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盛衰史。^① 伽罗法罗对11个版本的序言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包括恩格斯、拉布里奥拉、陶里亚蒂、霍布斯鲍姆、洛苏尔多和贝尔蒂诺蒂的序言。此外，对意大利右翼组织出版的序言也进行了介绍和批判。

^① Francesco Galofaro, Le prefazioni del Manifesto. Colpo d'occhio sullo sviluppo del marxismo in Italia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6797-le-prefazioni-del-manifesto-colpo-docchio-sullo-sviluppo-del-marxismo-in-italia>, last accessed on 18 January, 2018.

无政府主义者皮耶特罗·高里 (Pietro Gori) 是第一个为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作序的人。高里把社会主义运动描述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对等级森严下权利不平等的报复；第二阶段，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现代社会主义将成为普世性的，资产阶级暴政结束后，不再有新的暴政。显然，高里把《共产党宣言》勾勒成了带有革命浪漫主义动力的福音书。在他看来，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工具，就没有必要继续学习，只要毫不犹豫地直接采取行动就可以了。

1893年，在图拉蒂 (Turati) 的邀请下，恩格斯为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了序。这一版是由意大利社会党的理论党刊出版社“社会批评办公室”组织出版的。该版本的翻译是完整的，由备受克罗齐称赞的诗人庞佩欧·贝提妮 (Pompeo Bettini) 完成。恩格斯在序言中简单回顾了1848年欧洲革命。恩格斯认为，在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这场工人阶级的革命为建立民族国家和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打下了基础。在恩格斯看来，年轻的意大利与德国相似，国家统一与工人的国际联合一样重要。1848年革命背景中，尚无国家统一与国际联合这两大要素。在此后的45年中，资产阶级发展工业，同时，无产阶级日益壮大。恩格斯认为，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在中世纪最早发展了资本主义。中世纪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新纪元的开启，是以一位伟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个人物就是诗人但丁。恩格斯希望能够再度诞生一位像但丁那样开启新时代的诗人，以反映无产者的时代呼声。

拉布里奥拉 (Antonio Labriola) 是那个年代真正推动人们认识马克思并革新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他是罗马大学历史哲学系教授，曾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设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课程。为法国期刊《社会发展》(Devenir Social) 撰写的《纪念共产主义者宣言》一文，在1901年成为拉布里奥拉翻译版的《共产党宣言》的序言。拉布里奥拉序言的核心主题在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他指出，被描述为具有抽象理性的实证主义，通过孔德的跨阶级改良主义和斯宾塞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稀释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原本特质。从历史线性发展和决定论的视角——这从无产阶级夺权角度有其自身的含义，拉布里奥拉反对对历史与主观性关系的原本解读。一方面，历史进程围绕着我们并通过我们完成。因此，我们的意志被社会进程战胜，并屈从于后者。从这个立场来看，拉布里奥拉似乎是反对决定论的。另一方面，相对于历史进程，我们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原因也是结果、是终点也是过程。这个理

论，最终由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在反思党的作用时完成——反对实证主义机制，是创造历史的主体。

拉布里奥拉也是第一个对《共产党宣言》进行总结并质疑其科学性的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的预言而非时间顺序特征。或者说，马克思不像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那样提供具体的时间，而是描述了社会的形态，就像植物学家描述树叶一样。在树叶上，已经包含了可能的发展。这种观点令人想到了歌德的自然主义。拉布里奥拉不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共产主义批判。基于理论层面的共产主义批判的目的，是为运动提供历史的解读与武器。《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观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就像拉布里奥拉所言，它是在历史方向尚未超越古典世界的时候创作出来的。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总是经历两个阶段，尽管节奏不同：第一阶段，由小资产阶级、下等阶层、本能革命派所倡导的农业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更真实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也许是对意大利的希望，拉布里奥拉总是指出，诞生在热那亚的社会党主要是由资产阶级构成的。最后，拉布里奥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完善。经典价值理论构成了其核心。拉布里奥拉认为，马克思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了价值理论，因为他们意识到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直接通向马克思主义的。

20世纪初至1925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后一般会总附上重要文件：如1918年版附上了在世界大战期间举办的社会主义者国际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科尔塔尔会议的决议。其中，列宁所支持的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的立场，被一种普遍且抽象的和平主义观所压制。1925年，意大利的共产党的出版社再版了《共产党宣言》，仍是拉布里奥拉的译本。通过这种方式，拉布里奥拉的“共产主义批判”与新生的共产党之间，建立了思想的延续性。同年，意大利进入法西斯的独裁阶段，《共产党宣言》再版因此而中断。

1948年《重生》的特刊^①刊发了陶里亚蒂关于《共产党宣言》的文章，此后，被多次刊发并成为多个《共产党宣言》版本的序言。^②陶里亚蒂的序言是刚刚

① 该期特刊的名称为《1848年：文论与证据集》。文论中收入了卡涅塔（F.Cagnetta）的《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文译本》和梅佐蒙蒂（E. Cantimori Mezzomonti）的《共产党宣言的起源》。

② 遗憾的是，1973年版《共产党宣言》的编者奇亚拉蒙特（Gerardo Chiaromonte）指出，陶里亚蒂序言是不完整的。

走出战争和地下状态的意共的马克思主义遗产和主张。陶里亚蒂将自身与拉布里奥拉相联系，赞赏其对自己和葛兰西的思想训练产生了具有影响的辩证的反实证主义观。陶里亚蒂认为，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和新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共产党宣言》因其科学预言的实现，而变得现实起来。陶里亚蒂对政治学说概念的科学性的最初观点是：值得注意的，不是理论的发现预测的能力，而是它改造现实的能力。在陶里亚蒂和葛兰西的作品中，主体在历史变革中的伟大作用得到了承认，“君王”在现代性中化身为了政党。这种观点再次远离实证主义决定论，即历史的必然规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和胜利。而陶里亚蒂和葛兰西在20世纪最初10年间已经完全超越了这种决定论。^①

在陶里亚蒂看来，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宣言》成为自为阶级，赋予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基督教的、贵族的、资产阶级的……）以行动纲领和理论批判。陶里亚蒂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些非现实要素也进行了反思，认为最好要警惕这样一种思维，即任何可能的历史发展都已经被革命即将来临思想和理论所预言。《共产党宣言》的革命性意义是通过1848年的历史背景来解释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更加谨慎。在这些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陶里亚蒂的信念：阶级和相应政党之间的“运动之战”，在北约阵营内，已经转化为了“立场之战”。^②此外，陶里亚蒂认为《共产党宣言》是不完整的，列宁通过帝国主义理论和革命党理论完善了它。陶里亚蒂的总结总体是积极的，下层阶级获得的权力扩大了，反资产阶级的阵线也拉长了；帝国主义也丧失了其威信。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灾难以及当时群众面临极其困难的条件，陶里亚蒂仍然部分地感受到了历史性胜利的喜悦，《共产党宣言》则可以提升人们的乐观情绪，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赞盖里（Zangheri）为1983年版《共产党宣言》作的序，与陶里亚蒂的序言形成了鲜明对比。从重构《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框架以及史学分析的角度来看，它是落后和无趣的。同其他右派一样，赞盖里将马克思视为一个预言家，并在自由主义标准下，将其视为暴力革命和专制国家之父。不过，赞盖里认为马克思还有为民主和普选权而斗争的一面。赞盖里的序言是对抛弃了宗教与政治信仰，支持阶级合作机制的自由主义者的颂扬。赞盖里代表了这个时代

① 参见 Palmiro Togliatti, *Scritti su Gramsci*, Roma: Editori Riuniti, 2013。

② 参见 Palmiro Togliatti, *La guerra di posizione in Italia: epistolario 1944-1964*, Torino: Einaudi, 2014。

西方左翼的共同感觉：里根和撒切爾的自由主义获胜了，即使经济增长保持在最低水平时也是如此。社会民主主义本身也进入了危机状态：基于干预经济、公共债务和通过公共服务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国家形式陷入了危机。苏联解体的结局，使得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意识形态机制以及参照模式，都发生了偏移。1989年，社民党采用了所谓的“后物质主义”的柏林纲领，其中不仅有20世纪80年代环境运动的主题，还突出了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

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与50年前所不同的是，此时的工人运动陷入了极度衰弱的状态。因此，罗莎娜·洛桑达（Rossana Rossanda）撰文质询，“为什么150年后，在西方的被剥削阶级，尽管富于创新性的斗争经验，身处此前不为人知的通讯网络中，却不联合，不组织，不考虑团结，不考虑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统一的跨国主体”？这激发了20世纪末期主要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这一年，《共产党宣言》的再版量，成倍增长。

1998年，贝卢斯科尼传媒意图垄断对每个时期经典政治读物的解读。他们邀请曾经受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训练并加入过意大利社会党，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放弃马克思主义加入右翼阵营的科莱蒂（Lucio Colletti），为《共产党宣言》作了序。科莱蒂在序言中，依然将马克思视为科学家而非预言家。这个论断，出现在了1998年所有版本中，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M.韦伯等社会学家以及熊彼特和凯恩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的马克思。另外，作为先知的马克思是黑格尔式的。在科莱蒂看来，邪恶根源在于黑格尔认为历史有其终点，而这个终点只能是平等，没有阶级，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科莱蒂的观点与赞盖里接近，但右派承认了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积极作用，而同时期的左派，渴望在城市中证明自己，完全拒绝了自己的遗产。

桑归内蒂（Sanguineti）是意大利当代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为另一家不知名出版社再版的《共产党宣言》作了序。桑归内蒂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一种通过否定阶级斗争而否定无产阶级存在的意识形态得到了肯定，而无产阶级现在很乐意将自己投射到资产阶级的理想中来忘记自身的挫败感。无产阶级终结的论点在最激进的左派中和后工人主义的语境中扩散，最终甚至被重建共产党总书记法乌斯托·贝尔蒂诺蒂（Fausto Bertinotti）采纳。桑归内蒂认为唯物论中有预言与宗教要素，不反对本雅明（Benjamin）将马克思的思想归之于希伯来根源。然而，马克思作品中的唯物论，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神

学，而非反过来：马克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科学理论，而不是一种伪宗教。《共产党宣言》预言的恰当性和现实性恰恰在于资本主义成功的世界性扩张、全球化和全球市场之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所造成的灾难有可能在全球层面再现。在桑归内蒂看来，劳工运动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嵌含在资本主义的暴力转型中。但是，这没有导致福特制生产模式的终结；不仅如此，还扩张到了智力劳动范畴。在桑归内蒂看来，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做什么”。左翼衰落后，西方社会中只有教会最关注穷人。桑归内蒂注意到，以富人与穷人的对立代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并非中立的：前者不包含社会组织的含义，仅仅暗指现代性所带来的一种不幸，还预示着对封建主义和神权政治的怀旧观。教会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反动的，不是进步的。相反，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过去价值观的贬斥，始终是积极的。例如，传统家庭价值观，使得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导致了对女性色情和卖淫的控制。因此，现实中总有反动社会主义派别批判《共产党宣言》的力量在于为工人运动抵制各种时尚、诱惑和伪科学理论提供工具。而 20 世纪 90 年代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那些计划，不断地稀释成了贫乏却诗意的愿景，通过回顾遥远的未曾被玷污的历史，转化为了类似衰退理论的经济建议。

1998 年，霍布斯鲍姆为意大利里佐利（Rizzoli）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作了序，这一版本至今仍被广泛阅读。他首先对《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及其贡献作了非常重要的科学重构；其次对《共产党宣言》中过时的内容进行了评析，如 1848 年革命的失败、政治背景的改变、社会主义辩论的演进和政治词语的变化；最后，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成熟所起到的作用：1848 年的主题不完全是经济的，还有历史的。资本主义经济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实力，在于其发展的和社会转型的潜力。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社会转型的长期影响可以在现代性中发现。如果资产阶级对家庭的破坏是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最好描述，那么，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则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主题。这否认了此前的理论——世界南北分化是资本主义在历史与地理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尽管霍布斯鲍姆没有直接阐明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是偏离了标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与陶里亚蒂的观点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但是，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逻辑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展现了理论的转变力量；而经济体系的崩溃将历史带回已知的且危险的轨道。霍布斯鲍姆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和革命的到来。他们所作的真正预测，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无

产阶级在 20 世纪通过其革命的和改良的政治组织产生的历史影响，将与日俱增。马克思的中心论点是，无产阶级在没有解放社会其他部分的情况下不能解放自身。至于能否成功，当时没有说，现在也没有说过，马克思只是希望能够成功。《共产党宣言》远非政治上的决定论，它提出了战略、策略，预见了撤退和失败的可能性。霍布斯鲍姆的序言在对陶里亚蒂对遥远未来的乐观主义的质询以及在社会主义和野蛮之间的替代选择中结束。

1999 年，拉特尔扎 (Laterza) 出版社再版了《共产党宣言》，由洛苏尔多 (Domenico Losurdo) 作序。这个版本影响广泛，其序言体现了很多现实的背景要素。在自由主义高奏凯歌的时代，洛苏尔多重新提出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并阐明了其中的原因。

洛苏尔多通过对托克维尔、斯图亚特·密尔以及康斯坦特等自由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引述，指出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最基本特征——它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人口基数上的，几十万人拥有掌控数百万群众的权力。自由主义者通过将之与非政治领域严格挂钩，来解决激烈的冲突。洛苏尔多认为，马克思开启了一场认识论革命，推动阶级矛盾回归到政治领域。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与以赛亚·柏林 (Isaiah Berlin) 一样，强调消极自由的重要性，或免于一切制约的个体自由。柏林的消极自由是相对于国家的个体自由，从免受国家干预自行决定私人事务，逐步延伸到个人财产，包括在其中建立专制秩序的工厂。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制造等级制度的消极自由。自由主义者指责马克思的思想中缺乏免受国家限制的自由。他们往往引证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认识论，来辨析国家与权力，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一样落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进步之处在于抓住了阶级斗争的社会维度。

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现实性，洛苏尔多认为其中提出的全球化值得关注。这是一个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开启的进程。与陶里亚蒂一样，洛苏尔多也认为第一次全球化某种意义上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的。马克思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力量作为一种经济模式，不仅能打破其他（殖民地的）社会模式，还能将自身的模式强加于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看到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潜力，而列宁预见到了。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指出全球化与战争之间的关联，而这在今日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贝尔蒂诺蒂 (Bertinotti) 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总书记，为 2005 年阿莱格雷 (Alegre) 出版社再版的《共产党宣言》作了序。该序言在今天看来已经

远远脱离现实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里根和撒切尔自由主义政治开放三十年的分水岭。贝尔蒂诺蒂为马克思的思想在意大利不像在法国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中间那样流行而感到遗憾。右翼和落后的左翼都认为它已经过时。反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年轻人与和平主义者，也都不读马克思的作品。然而，贝尔蒂诺蒂却宣称，这些年轻人开始重写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并恢复 20 世纪工人运动的遗产。当然，这在当时各种抗议运动高涨的背景下，是颇具说服力的。但是，此后的历史很快表明，这严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贝尔蒂诺蒂认为，如果工厂的生产形式延伸到整个社会，那么工人的作用相对于临时工、自由职业者和失业者，就会丧失其中心性。工人阶级将会是碎片化的，不再表现出泰勒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团结一致。伽罗法罗认为，贝尔蒂诺蒂的这个观点没能抓住导致剥削的结构性要素，仅仅停留于现象本身。

贝尔蒂诺蒂也认为马克思是全球化的先知，惊讶于资本主义的力量。但是，贝尔蒂诺蒂认为，这股力量在历史上并非线性的，因为帝国主义把地球分为了南北两个世界——这个观点已经被霍布斯鲍姆所超越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比此前封建社会进步。但是在贝尔蒂诺蒂看来，发展的进步，不再契合于时代，带来的只有对环境的破坏、战争和灾难。贝尔蒂诺蒂对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并不感兴趣，而是打断了传统，追求更新的“时尚”：将马克思剥离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之与列宁主义和葛兰西主义分离。贝尔蒂诺蒂认为，左派的对手因此面临着重组阶级和构建能够成为反资本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替代品的“新主体”的目标。伽罗法罗认为贝尔蒂诺蒂是一个异端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家，为其追随者所推崇，但是必然会带来完全无效和无根的实践。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死亡与重生

本部分围绕洛苏尔多新著《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死亡、重生》^①，以及相关书评的主要内容展开。

^① Domenico Losurdo, *Il Marxismo occidentale. Come nacque, come morì, come può rinascere*, Roma: Laterza, 2017.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死亡、重生》的主要内容

2017年洛苏尔多出版了其最新力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诞生，如何死亡，如何能够重生》，以下简称《西方马克思主义》。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的主题是“1914年和1917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914年8月，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17年10月，是东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转折点。本章主要内容还包括东西方的“货币经济”，反帝国主义战争与反殖民地战争之间的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弥赛亚信念；东西方对抗不平等的斗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稳定界限；难以赢得相互认可的斗争。第二章的主题是“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还是反殖民主义VS殖民主义”。这一章的内容包括从无产阶级革命到反殖民革命；欧洲心脏的殖民问题与民族问题；“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丹尼尔森困境（Dilemma di Daniel son）与两种马克思主义；早期与战后三十年末期的两种马克思主义。第三章的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反殖民革命：缺席的碰撞”，主要内容涉及博比奥—陶里亚蒂在比安富年的辩论，德拉·沃尔普和科莱蒂的半个马克思；“工人主义”与第三世界主义的谴责；反人文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之间的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倒退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回归；布洛赫的自由主义变形与遗产；从反专制主义到亲殖民主义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帝国普遍主义；谁不愿谈及殖民主义，应该在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上也保持沉默；马尔库塞与对“帝国主义”的艰难再现；8月4日的“批判理论”和“具体的乌托邦”；1968年与大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萨特的民粹反殖民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反殖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蒂安帕拉；卢卡奇的孤立状态。第四章的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与死亡”，主要内容有“西方的光与安全”；阿伦特的崇拜与殖民主义—纳粹主义联系的消除；第三帝国——从殖民主义的历史到疯狂的历史；被告席上的殖民主义或其受害者；阿伦特——从第三世界到“西半球”；福柯与从历史中被剥离的殖民地人民；福柯和种族主义及生物政治的深奥历史；从福柯到阿甘本（通过莱维纳斯）；奈格里、哈特与《帝国》的公开狂欢。第五章的主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抑或最后一次闪光”，内容有齐泽克的反—反帝国主义；齐泽克对反殖民革命的贬低及对毛泽东的妖魔化；哈维和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绝对化；如果巴迪欧读过陶里亚蒂，“权力转化为爱”，“批判理论”，“融合团体”，放弃权力；从罗伯斯庇尔到列宁的反对“短语”的斗争；战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死亡证明。第六章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西方重生”，内容有马克思与四大时代的未来；反对世界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的漫长斗争；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和两种不同的非永恒性；恢复与世界反殖民主义革命的关系；黑格尔的教训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复兴；东方和西方：从基督教对马克思主义。

洛苏尔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衰落，要归因于对 20 世纪历史真正的转折点，即反殖民斗争的忽视上。“一战”带来的巨大伤亡，让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恐怖性，以及推翻这种制度的迫切性。布尔什维克立即采取了行动，十月革命被欧洲视为阻止了战争且对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吸引力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推动亚洲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独立的现代国家转型。而在这一进程中，西方无产阶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似乎消失了。洛苏尔多在这一历史框架内，对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年轻的布洛赫将国家定义为“典型的强制性，异教徒和撒旦式的本质”，并且拒绝接受国家观念。在十月革命浪潮中，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不同的立场——从殖民压迫中获得民族独立才是优先考虑的。洛苏尔多一方面坚持西方帝国主义冲突的解决存在于私有经济和货币及其相关权力的终结之中，另一方面则认为，东方贸易、货币经济代表着革命计划的生存与延续（如中国共产党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解放区所做的）；在西方，战争的巨大破坏性使人担心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而在东方，只有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民族国家才能赢得独立的基础，满足人民的需求。总之，“一战”的经验使得欧洲开始想象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未来”，而东方欠发达国家在战胜资本主义之前，要先发展生产力——这也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观点。

洛苏尔多认为，不仅仅是历史和物质条件导致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还有文化传统。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犹太基督教弥赛亚派的影响增强，进而将对世界的改造视为从消极和罪恶中的救赎。而在东方，没有这些弥赛亚意象，传统文化的差异性使得马克思的理论得到了更加务实的接受。但是，这样一来，就涉及如何定位苏维埃俄国的问题了。因为很多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西方流亡，包括列宁，在“一战”正酣、十月革命前夕，出版了《国家与革命》，表现出了在国家消亡与清除殖民统治以建立独立民族国家间的摇摆立场。不过，洛苏尔多坚持认为，列宁及其追随者都将殖民问题列为中心问题。在夺权后，甚至期望革命向整个欧洲扩展，以实现前所未有之历史转型。

洛苏尔多也认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存在矛盾。因为，东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角是从殖民统治中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角是拒绝为精英战争而服务的工人阶级。但事实上，从一开始，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列宁后来对殖民地问题和民族独立问题也有了更为前瞻性的思考，独立的弱小民族，也会一直处于大国的摆布之中。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在这里基本就已经成型。科莱蒂嘲讽为欠发达国家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特隆蒂炫耀自己从未跌入中国人的反世界秩序主义、包围城市和万里长征的陷阱。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哲学对反殖民主义构成了全面威胁；霍克海默认为苏联是一个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忽视了苏联在1942年对纳粹战争中的突出表现，以及战后西方“文明国家”与苏联“专制国家”在越南殖民问题上的鲜明对比。马尔库塞意识到了殖民问题的核心意义，但却怀疑越南人民取得的胜利及其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福柯对殖民主义的剥离，阻碍了对资本主义的恰当解读，使得其种族主义和生物政治的历史理论研究效力减弱。奈格里和哈特高调赞扬了美国的革命与民主，却忽视了其真实含义——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对殖民地人民而言，是反革命而非革命。齐泽克对殖民地人民的命运进行了抽象概括，清除了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等概念范畴，仅仅对威权资本主义和非威权资本主义作了区分，并将中国和民粹主义的拉美列入了前者。只有葛兰西和卢卡奇超越了这些论调。葛兰西明白，对于西方主流文化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对抗“白色超人”的傲慢和偏见的人文主义，而卢卡奇无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还是在成熟的著作中都没有关注殖民地问题，只是在1924年专门写给列宁的一本书中描述和分析了“受资本主义压迫和被剥削的民族的革命作用”。

此后，洛苏尔多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在西方重生的问题。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时间特征：一个是正在实现的未来，一个是即将实现或遥远的未来。走向共产主义的国家，在处理好现实关系的同时，已经在后资本主义未来的门槛上停下了脚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资本主义未来密切相关，还没有处理好自身弥赛亚式的乌托邦问题，应该学会在正在实现的未来与遥远的未来之间搭建桥梁。就像在东方一样，社会主义的前途离不开反殖民革命的全面实现，而在西方，社会主义通过反对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军国主义诱惑日盛的资本主义的斗争来实现。只有克服每一种教条主义态度，与自身的

时间特征相关联，开始哲学化而不是预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可以重生。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死亡、重生》的相关评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死亡、重生》出版后，在意大利获得了很大反响，多名左翼学者，其中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了书评，就其中某些内容与作者进行了商榷。佩特鲁贾尼（Stefano Petrucciani）在《宣言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来自东方的革命》的书评^①。他指出，在洛苏尔多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局限性在于没能理解，从俄国吹向中国和第三世界的革命之风，为何比在欧洲更猛烈。在开始探讨这一难题之前，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界定，即哪些理论属于这一范畴。第一个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梅勒—庞蒂，在1955年的《辩证法的历险》中，将卢卡奇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将其中一个指向辩证法领域，另一个指向自然唯物论领域。但是，使得这一名词更为出名的是《新左翼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他在1976年推出了一本题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著作，并很快出版了意大利文版。而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始于两部伟大的作品——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卡尔·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聚焦于哲学独特的使用方式和阐释马克思的方式。此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精致的哲学主体，不再可指摘其粗糙或幼稚，但对列宁的唯物论，依然可以提出批评。安德森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萨特、列斐伏尔、阿尔都塞等，意大利的德拉·沃尔普和科莱蒂，甚至安东尼奥·葛兰西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它是20世纪的一种重要哲学经验，重要意义不亚于“资产阶级”的本质主义、现象学、逻辑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等。应该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沉淀下来，还有多少潜力可以挖掘。而洛苏尔多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即东西方革命命运的视角。为了证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近视眼，大段引用了原文。佩特鲁贾尼认为，洛苏尔多没有从本质上明白，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的伟大历史结果是与反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中国、越南、古巴），并成为反殖民革命和20世纪历史转型的关键推动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点并非是无视的。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未放弃这一观念，即认为在这个世纪，最应该改变的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也这么认为）。但是，如果说这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命运毫无关

^① Stefano Petrucciani, *La rivoluzione venuta da Oriente, il Manifesto*, 05 Maggio, 2017, p.16.

系，也不尽然。洛苏尔多对霍克海默、布洛赫和阿多尔诺以及克莱蒂等的批判是正确的，但是，对齐泽克和阿尔·巴迪欧的批判，在佩特鲁贾尼看来，就过度了。卢卡奇在1924年关于列宁的书中，就将反殖民主义作为其思想的中心，尽管洛苏尔多将之批判为“民粹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反殖民主义。阿尔都塞认真研究过东方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的思想，他是赋予了其过多的价值还是将之妖魔化了？马尔库塞也是将反帝国主义斗争真正置于中心点的。洛苏尔多本人也注意到马尔库塞认为“只有构建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赢得反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真正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自由：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东方的革命实际上是不同于马克思头脑中的以及西马所仍相信的自由的。对洛苏尔多而言，只有一种革命是现实的，历史上已经验证的并获得胜利的——但是如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要保持耐心。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成为了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理论难题。

欧迪（Oscar Oddi）在《物的后果》上撰文介绍了洛苏尔多新作的內容，并撰写了评论。^① 欧迪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者——卢卡奇与柯尔施，所提出的绝非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解释现实以及改造现实的问题。列宁也曾提出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运动的观点。但是，东西方革命进程的內部，问题的症结不同，所选择的道路也不同。工人主义和后工人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是在具体情境下产生的，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拥有了其影响力。但是，西方底层阶级遭遇了失败，而资本主义体系并不容易修正，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修正，因而正在变得更加不公正和暴力。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问题在于局限于学术领域，完全或几乎完全脱离了任何剧烈的社会运动，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背景，不能理解它所身处其中的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许可以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中获取复兴的活力。

意大利共产党国际部主任贾尼（Fosco Gianni），在“21世纪马克思”网站上，也撰写了一篇题为《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意大利共产主义的危机》的评论。^② 贾尼在对洛苏尔多新著的内容进行梳理后，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历史进行

① Oscar Oddi, Domenico Losurdo, *Il Marxismo occidentale. Come nacque, come morì, come può rinascere. Consecutio Rerum*. Anno II, numero 3, pp.363-370.

② Fosco Giannini, *Sul marxismo occidentale e sulla crisi del comunismo in Italia*,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156-sul-marxismo-occidentale-e-sulla-crisi-del-comunismo-in-italia>, last accessed on 20 January, 2018.

了反思。贝林格与苏联的“决裂”不再令人费解，意大利共产党实质上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不能再对“十月革命的动力已耗尽”的论断的政治理论本质进行搪塞了，这是功能性的和根本原则性的。其中“动力耗尽”的观点，意味着共不仅仅是与苏联的决裂，还是与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文化的决裂。不能继续歪曲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本质：它赋予了欧洲工人阶级的所谓多余性以生命力，完全消解了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贵族”概念，也消解了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和反殖民地斗争的作用以及“伟大世界”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经验。把一切都收缩至欧洲，对意大利选择北约给予了戏剧般的肯定。就像洛苏尔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贝林格选择了北约，即已经意味着意大利共产党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意味着意大利共产主义走向了死亡。

特隆达 (Aldo Trotta) 为“21世纪马克思”网站撰文，对洛苏尔多的新作作出了述评。^① 特隆达认为，尽管困难重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西方的复兴并非绝无可能。与洛苏尔多冷峻的诊断一致，他认为有必要恢复所缺失的与反殖民世界革命的关系，要意识到（新旧形式的）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之间的冲突远未结束。这在国际舞台上依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没有必要、尖锐且深刻的批判，那么对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而言，是不完整的。但不幸的是，这经常发生，尤其是那些致力于捍卫和巩固独立自主决定自己道路可能性的人们而言。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可能重生，在理论上是超越了政治的，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希望。洛苏尔多在书中提出了要重视并重现的三大原则。第一个是黑格尔提出的，做哲学不是穿先知的衣服，要随时准备以纯洁却无法抵达的远方之名从乏味的现实中撤离；做哲学意味着尽力用各种知识理解自身的这个时代，同时要承受认识历史现实、历史矛盾和冲突之艰难。第二个是马克思提出的，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时代，既要避免陷入洛苏尔多所说的“无辜的诠释”陷阱，又要避免斥责与社会转型无关的斗争与运动。第三个原则是列宁提出的，谁对这种革命，这种天堂般的世界充满期待，就应该明确地了解到，它们都是想象的产物。总之，为了最终告别弥赛亚式和乌托邦式期

① Aldo Trotta, Per la rinascita del marxismo in Occidente. L'analisi di Domenico Losurdo,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013-per-la-rinascita-del-marxismo-in-occidente-lanalisi-di-domenico-losurdo>, last accessed on 20 January, 2018.

待——它们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突出要素，也是非边缘部门的工人运动政治主张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重现这三种原则并展开一场富有灵魂与活力的讨论，是非常迫切的。

三、葛兰西研究新动向

2017年恰逢葛兰西逝世80周年，意大利举办了相关研讨会暨纪念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由葛兰西基金会、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以及百科全书研究所，于5月18日至20日在罗马组织了一场题为“霸权与现代性：在意大利与国际文化中的葛兰西思想”的大型国际研讨会。整个会议共分为五个子议题，第一个子议题是“传记和作品：收获与希望”，与会者发言题目有“新狱中札记”、“新闻与政治作品”、“通信”、“感情”与“生活”；第二个子议题是“意大利文化中的实践哲学与霸权”，与会者发言题目有“二十年之后的‘争议的葛兰西’”、“实践哲学与科学语言的可转译性”、“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文化历史与哲学历史中的葛兰西”、“超越反法西斯范式：葛兰西与对法西斯的阐释”、“大众的国家与霸权：关于弗朗克·德·费里奇（Franco De Felice）对葛兰西解释的注释”、“无差异的地域与权力的地域之间的市场与霸权”、“意大利阶级关系的描述”；第三个子议题为“世界葛兰西研究：欧洲与美国”，与会者发言题目有“美国的文化研究”、“霸权与文学”、“调节学派与葛兰西在法国的回归”、“二战后意大利人类学对葛兰西的解读”、“将人民转化为政治主体：在蛊惑、人口学与民主之间的葛兰西、人类学与民粹主义”、“埃尔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霸权：从马克思主义到对话理论”、“阿尔都塞与普兰查斯：霸权与美国”；第四个子议题是“世界葛兰西研究：亚洲与拉美”，与会者发言题目有“葛兰西在印度：资本主义霸权与次级政治”、“方向霸权与主导霸权：葛兰西政治理论核心概念分析”、“葛兰西的遗产在阿根廷”、“附属性与进步性：对葛兰西被动革命概念的再解读”、“美洲，拉丁美洲”、“葛兰西透视镜下的民粹主义”、“独裁后的巴西，基于葛兰西思想的反思”；第五个子议题是“葛兰西研究的新阵线”，与会学者发言的题目有“美国的文化研究”、“从国际主义到‘新型世界主义’”、“国际研究中的霸权与语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葛兰西思想评析”、“霸权与性别研究”、“后霸权主义：一步向前两步后退”、“葛兰西与英语世界”等。此外，葛兰西基金会主席彭斯教授在开幕式上

作了题为“葛兰西与俄国革命”的发言。^①

《今日葛兰西》(Gramsci Oggi) 电子杂志复刊^②，在 2017 年第 2 期刊载了意大利左翼学者最新的关于葛兰西思想的研究成果或新的思考，主题有“葛兰西与霸权：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当葛兰西遇到列宁与托洛茨基”、“葛兰西与达尔文”、“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等。赫贝尔在《葛兰西与霸权：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中指出，“霸权”这一概念，是葛兰西比同时代思想家更为出名、更易于让人接受的“秘密”所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葛兰西的理论是关于西方革命的理论，针对或多或少已经比较发达且面临复杂的转型问题的社会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葛兰西思想与列宁思想一样，都是在 20 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920 年，葛兰西指出在十月革命中，有着“普遍意义上的经验”，工人阶级能够说服大众的大多数，表明彼此间利益的一致性，并成功建立起国家。这就是一种“霸权行动”。这种思想也表现在了对意大利革命的认识中，葛兰西主张中北部的工业无产阶级与南部的农民阶级建立同盟，组建“工农联合政府”。工人阶级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任务，但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行动中，要成为领导阶级。在这一过程中，意大利的工人阶级还要解决意大利的南方问题与梵蒂冈问题。无产阶级的政党，则是一个拥有“霸权”的机构。在其中，要“创造意识形态土壤，对意识与认知的方法进行改革”，在持续的高强度的争论中，形成集体认识和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在取得政权之前，要赢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斗争。如今，意大利面临更为复杂的局势：意大利人与移民，稳定就业与不稳定就业，而合作主义又使得工人阶级碎片化加重。因此，今天的意大利左翼，深入研究和实践葛兰西的“霸权”、“阵地战”等理论，意义重大。

国际葛兰西协会意大利分会在 2017 年也推出了一篇颇具深度和分量的研究成果——《另一个葛兰西?》^③。此文从四个角度对葛兰西及其思想进行了解析，即历史、理论及其结构、文化、阶级与劳动——美国与福特主义。历史部分分为两个主题，即历史学方法与伟大的隐喻——（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

① 参见葛兰西基金会网站公布的会议议程：<https://www.fondazionegramsci.org/convegni-seminari/egemonia-e-modernita/>, 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② 参见 <http://www.gramscioggi.org/>, 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③ Alberto Gianquinto, UN ALTRO GRAMSCI? <http://www.igsitalia.org/magazzino-igs/testi-provisorio/261-un-altro-gramsci>, 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和与本雅明的比较：寓言。在葛兰西论及重要的历史时期如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时，要对其所语焉不详的“历史”方法，进行思考。葛兰西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常常与其他时空中的历史事实进行比较。就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对政党和启蒙知识分子的隐喻一样，葛兰西所创造并描述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必要的隐喻，用以理解新的政治文化和当代文明出现的进程。隐喻不是寓言。葛兰西认为，他生活的时代还需要一场新的宗教和世俗的改革，本雅明认为，“方法”才是哲学论点的系统表述。哲学的方法及其主旨是寓言，而不是主体和真理的身份（真理是超验的）。具体而言，寓言的方法是“马赛克”的“构图”；马赛克就好像有句子，句号，引语的气息，其余的都是构图。马克思主义应从内容（阶级斗争）而不是其方法和形式去理解。但是，在葛兰西与本雅明“文化”的中心地带，都发现了宗教。在寓言中，它是对真理的超越，会引起一阵恐慌的呼声，并产生一种弥赛亚的历史观；在比喻中则相反，宗教是现在（在哲学和世界观的“延伸”范围内）的组成部分，像国家和政党之间的不可分离，也是一种周期性政治“重组”的基础。

理论及其结构部分，分为三个主题，即意识形态与霸权，政党、社会、国家，雅各宾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真实或虚假的观念体系，在其政治实体中，总是一种超越其他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它被认为是由一个政党组织或组织的哲学。根据循环论的“法则”，推测性思想产生了政治意识形态，因而产生了霸权：即使是国家从纯粹的经济合作阶段过渡到通过文化产生的（积极同意的）霸权阶段，但它本身也具有与真正霸权解体的时刻相吻合的宗教投机维度。葛兰西认为，政党不仅代表本阶层的利益，甚至有可能因为本阶层的利益而反对整个民族的利益。政党建立并生存于社会之中，社会要求政党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政党的“智识”的作用在于超越自身的利益。对于雅各宾主义与革命方面，葛兰西的论点可以视为对雅各宾主义可能的且必要的超越，在霸权概念中的永久革命理论实践应被理解为国家力量理论的补充。文化部分由民族与人民、科学、可译性与比较主义，与本雅明的比较等主题构成。葛兰西赋予了人民与民族极大的政治和文化价值，提出了人民—民族或民族—人民概念。民族—人民，是一种集体意志，是一种共同的意识。科学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哲学；它被实践哲学所接受，这种实践哲学（以这种方式）高于它并且对它进行判断，将它与“常识”进行比较。

四、关于十月革命的讨论

“21 世纪马克思”网站刊载了系列纪念十月革命及探讨其意义的文章。其中有洛苏尔多的《十月革命与民主》、卡托内的《历史视域下的十月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①、贾凯的《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活动》^②和萨米尔·阿明的《1917 年 10 月：昨天与今天》的引言^③等。

阿明在其新著的引言中指出，伟大的革命创造了历史，而保守的抵抗与反革命只不过延缓了这一进程。法国大革命开创了现代政治和现代民主，俄国革命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革命将从帝国主义压迫中获得解放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结合了起来。这些革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的纲领深刻反映它们那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它们会在发展中遭到现实的抗拒，这些抗拒从本源上来说是落后的，是“热月的”和“复辟的”。这些伟大革命的抱负都表现在了它们的口号中，虽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十月革命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毛主义的“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团结起来”，并没有立刻转变为现实。但是，这些口号却号召了人民继续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斗争。因此，不可能通过对大革命的抽象化来理解这个世界。纪念这些革命，意味着对它们的抱负进行重新评估——今天的乌托邦，就是明天的现实，同时还要理解它们暂时的落后。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都拒绝这么做。他们只愿意相信，伟大的革命不过是不幸的事件，而参与革命的人民，出于不切实际的热忱，走上了不归路，而非正常的历史道路。这些人应该因过去犯下的罪行而遭到惩罚。保守主义者既不想实现人类的解放，消除不平等，也认为这不可能。个体间与人民之间的不平等，劳动剥削与异化，

① Andrea Catone, *La Rivoluzione d' Ottobre e il Movimento Socialista Mondiale in una prospettiva storica*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464-la-rivoluzione-dottobre-e-il-movimento-socialista-mondiale-in-una-prospettiva-storica>, 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② Vladimiro Giacché, *Dopo la rivoluzione: i primi atti del potere sovietico*,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192-dopo-la-rivoluzione-i-primi-atti-del-potere-sovietico>, 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③ Samir Amin, *Ottobre '17: ieri e domani*, <http://www.marx21.it/index.php/storia-teoria-e-scienza/marxismo/28307-ottobre-17-ieri-e-domani>, last accessed on 12 January, 2018.

对他们而言都是永远存在的。

在洛苏尔多看来，性别歧视、财富歧视、种族歧视，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还无处不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运动，赋予了每个个体选举与被选举的政治权利。普选权确立下的现代民主，最终超越了这些歧视。有人认为苏联与希特勒政权是相似的，这是一个荒谬的观点。尤其在种族歧视方面，它们是完全对立的：前者在反种族歧视斗争的最前线，而后者致力于制度化、强化这种歧视。

卡托内认为，十月革命最为深远的影响，是推动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重新站了起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伟大功绩在于将西方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结合了起来。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这两大阵营真正地建立了联系。虽然苏东剧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重回资本主义轨道，但十月革命最深远历史影响是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近代历史上被压迫民族的崛起——以中国为代表。为何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发生在了边缘国家，而没有发生在核心帝国主义国家？卡托内认为，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力量过于强大——如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以及阿尔都塞对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分析，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二战”后，苏联在反纳粹战争中的胜利，鼓舞了法、意等西欧国家抵抗运动的蓬勃发展，共产党力量空前壮大，但是始终没有出现革命的时机。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帝国主义链条遭遇了严重削弱，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才真正有可能开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